

开放丛书·思想文化系列

任延黎 译 苏绍智 校

革命与改革中的布哈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革命与改革中的布哈林

——布哈林国际讨论会文集

任延黎 译 苏绍智 校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革命与改革中的布哈林

任延黎 译 苏绍智 校

责任编辑：张文达

封面设计：张宏冰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水利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25·插页2·字数140千
1988年8月第1版·1989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401—5600

ISBN 7-5316-0315-2/D·3 定价：2.30元

原编者按

近来，在西方史学界常可听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名子。这一方面说明，对苏联20—30年代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的人物和事件，有了一种全面的重新评价；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注重“大人物的历史”这种盎格鲁撒克逊史学家的传统是多么根深蒂固。为了说明布哈林的“平反”自何日始，当然要提到关键的两本书：亚力山大·厄尔里希1960年所著的《1924年—1928年苏维埃工业化的论战》和斯蒂芬·F·科恩1971年所著的《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

姑且不分析这两部著作各自的特定内容，我认为它们代表了论述布哈林的形象和政治活动的两种不同写法，本文集发表的同一作者的文章再次证实了这一区别。

厄尔里希试图在苏联二十年代中期以来进行的政治和经济大论战这个更为广泛的范围里看待布哈林，并且要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主张之间找到共同点，而这两个人是公认的对立人物。此外，如果可以把“右派”和“左派”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看成是“共同的”，那么它们的结局却不尽相同。

与此相反，科恩所写的传记试图强调的是，布哈林这场斗争的“取代”（alternative）特点，无论在党内还是

在国内“右派”政治路线的坚定性，以及与一向由托洛茨基代表的那条路线相比，布哈林路线时至今日仍显得更为丰富多彩。在苏联和东欧国家60—7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大辩论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两部著作通过大量论述，各自作出了不同贡献。它使布哈林的形象及其政治活动在苏联史上占据了应得的地位，进而对分析斯大林主义本身的现实意义再次提出了新的看法。

近年来，布哈林问题对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具有的魅力，很快就演变成对历史的评价和更为离心离德的政治态度，这是这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局势的特点的产物。最后，意大利历史学家们为了了解苏联历史，特别是共产党的历史的许多方面和时期作出了贡献。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这个前程远大的行列。这里，对历史的深思胜于对政治的爱好和进行比较的诱惑。

按照这种愿望，在葛兰西学院及其社会主义国家资料研究中心的倡议下，于1980年6月27日至29日在罗马举行了“关于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中的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主张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主要学者和意大利及东欧的历史学家们一同出席了讨论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本书按照讨论会的五个中心议题编排各篇报告及按正式日程进行的发言。但是，要把讨论会的发言全部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主要是因为论文和发言的数量太多，且有相当一部分发言由于技术原因而未能整理出来。这就有必要进行选择，就不可避免地要对选稿的意向有所约束。办法是尽可能

客观地按照讨论会的正式日程，选取构成讨论会主体的、而所有的发言又以某种形式谈及的论文。当然，本文集未能再现讨论会的活跃气氛和缤纷色彩，但我相信，它无论如何还是清晰地呈现了涉及到的论题的全貌，尤其是明确地勾划出了不同的论述方式的轮廓。这里发表的论文，从整体上说体现了讨论会上进行的争论，还为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批可观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与布哈林的形象和活动有关，而且广泛涉及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历史问题。

译 序

布哈林生于1888年10月9日，含冤惨死于1938年3月14日。今年，1988年正值布哈林诞辰100周年和忌辰50周年，我有幸把《革命和改革中的布哈林》一书奉献于读者，对我来说，有如偿还一笔债务似的慰藉。

1980年6月，意大利共产党主持在罗马郊区福拉多加的陶里亚蒂学院举行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式与会者50人，均系当代世界上研究布哈林的著名学者，如首先重新研究布哈林的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厄里奇，首先撰写布哈林政治传记的美国学者斯蒂芬·F·科恩，著名的意大利党史学家保禄·斯普里亚诺，等等。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阵容之强，读者只需看一下本书论文的作者，就可知其梗概。有意思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出席者只有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学者，苏联虽被邀请，但未派人参加。我本人有幸被邀作为观察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意共尚未恢复党的关系。贝林格那时还健在，并出席了会议。他高兴地对我说：“中国同志参加这次会是有历史意义的。”

确实，这次会对我、甚至对中国学术理论界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由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

书”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我国的深远影响，加之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闭关锁国，国人对世界的新事物知之甚少，囿于苏联的宣传，布哈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乃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所说的：“人民公敌、匪帮暴徒、人类蠢贼、自卫侏儒小丑、法西斯奴仆、出卖国家秘密并为外国侦探机关供给消息的间谍，谋刺列宁等的杀人犯……。”总之，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没看过《联共党史》的人，也会从《列宁在1918年》电影中，把他看成是指使暗杀列宁的那一个猥琐的歹徒。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却驱散了几十年的迷雾，使我初步看到了历史的真相。

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目的是，使人们通过摆脱各种辨护性或诬蔑性的看法，来把各种观点进行比较，对布哈林进行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和批判性的研究。会议由意共领导成员罗塞里奥·维拉里致开幕词后，即分五个专题进行讨论：（一）布哈林与“建设社会主义”；（二）布哈林与革命的国际问题；（三）布哈林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四）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确立和对布哈林的判决；（五）关于东欧国家改革的争论及其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联系；最后，由保禄·斯普里亚诺作总结。读者认真阅读此书就可以知道这次会议的报告和讨论都是高水平的，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表现了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著作进行分析和阐述的严肃性；排除了简单化的论断和轻率地同今天的问题联系，向世界重新提出了布哈林的形象和事业问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报告和讨论的内容有待于读者亲自品尝，自然无需我在

这里多说。

讨论会没有讨论布哈林案件本身。因为与会的学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研究布哈林问题，通过确凿材料，证明布哈林案件是一桩冤案，布哈林本人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事。我在会前会后和与会的学者进行交谈，进一步了解情况，并承他们向我推荐和赠送不少书籍，特别是斯蒂芬·F·科恩的《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肯·科茨的《布哈林案件》，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按：这些书都已译成中文）。使我深信他们的看法无懈可击。意共领导人朱塞佩·博法告知我，讨论会的全部文件将整理后出版，并尽快地寄给我。我答应他将把讨论会情况向国内学术理论界介绍，并将尽快把讨论会的文集翻译出版。

我回国后曾多次向学术理论界介绍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受到我国学术理论界的重视。正如保禄·斯普里亚诺所说：“要求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位杰出代表和三十年代审讯的其他受害者伸张正义，不仅涉及他们的历史功过问题，而且也是出于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需要。”

罗马讨论会的论文集《革命和改革中的布哈林》于1982年1月出版。博法迅速地寄来，我当即安排了翻译。在国际上，虽然可以说布哈林早已平反并恢复名誉，但在苏联，却步履维艰。今天，在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公开化的政策下，正在向真理迈进。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中重新说到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肯定了布哈林的作用和错

误。同时戈尔巴乔夫明确地说：“十分明显，正是由于缺乏苏维埃社会民主化的应有水平，才使个人崇拜，使30年代的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成为可能。坦率地说：“这是在滥用权力的基础上的真正罪行。成千上万的党员和非党人士遭到了大肆镇压。”又说：“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现象对党对人民所犯的过错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谅的。”《莫斯科新闻》周刊1987年第49期公开介绍了布哈林的生平并刊登了他的绝笔信。这一切说明，即使在苏联，为布哈林等的平反也势在必行，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审判”中不能辞其咎。

本书的中译本的出版必将提高我国对布哈林乃至其他布爾什维克领导人及其思想与事业、功与过、经验与教训的研究水平。

苏绍智 1988年元旦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目 录

原编者按

引言……………〔意〕罗萨里奥·维拉里（1）

第一部分 布哈林与“建设社会主义”

布哈林与布哈林主义…………〔美〕斯蒂芬·F·科恩（8）

苏联二十年代历史中的布哈林

……………〔意〕弗朗切斯科·本维努蒂（19）

布哈林的“取代思想”…………〔英〕亚历克·诺夫（28）

布哈林：时代与人…………〔捷〕米切尔·雷曼（38）

第二部分 布哈林与革命的国际问题

从《帝国主义》* 到反法西斯斗争

……………〔意〕朱塞佩·博法（50）

布哈林、共产国际与法国共产党（1926—1928）

……………塞尔杰·沃利科夫（65）

布哈林如何看待国内革命与国际革命的关系

……………〔意〕阿尔多·阿戈斯蒂（78）

第三部分 布哈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布哈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意〕阿尔多·查那尔多（82）

： i ：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的若干评论

-〔南〕伏伊斯拉夫·斯坦诺伏西奇 (100)
- 对布哈林的不同看法.....〔意〕维托里奥·斯特拉达 (122)
- 布哈林与“新党的建设”
.....〔意〕鲁奇亚诺·格鲁比 (128)

第四部分 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确立和 对布哈林的判决

- 布哈林与新利维坦国家.....〔美〕莫西·莱久 (144)
- 布哈林与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
.....〔美〕罗伯特·塔克 (167)
- 布哈林和三十年代的经济“新方针”
.....〔意〕法比奥·贝塔宁 (179)

第五部分 关于东欧国家改革的争论及其 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联系

- 布哈林与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
.....〔波〕W·布鲁斯 (190)
- 评W·布鲁斯的论文
.....〔英〕亚历山大·厄里奇 (204)
- 从缺少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到六十和七十年代在
政治上利用“新经济政策”的失败
.....〔意〕阿德里亚诺·奎拉 (209)
- 结束语.....保禄·斯普里亚诺 (219)
- 后记 (223)

引 言

〔意〕 罗萨里奥·维拉里

众所周知，随着对苏联历史的兴趣不断增长，近年来在许多国家中，对布哈林的历史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意大利学者们也为深化这一研究作出了不可等闲视之的贡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产生了聚会和讨论的愿望，而葛兰西学院则象在其他情况中一样，按照自己活动的宗旨，乐于支持这一愿望并做出安排。

但是，尽管这个解释是符合事实的，却不足以说明这次讨论会的积极的真实本质。很明显，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事实上，尽管对布哈林的研究冲破了在苏联进行的政治大辩论所形成的禁锢，脚踏实地地对历史进行研究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总的看来，还不能说伴随布哈林终生并在他死后仍长期集中在他身上的大辩论的阴云和对他的歪曲已完全消除。我们认为，以我们召开这次讨论会的积极性来再次提出全面恢复布哈林在苏联历史及共运史中的地位的要求，并不是多余的。所以，我们提出这次讨论会的首要目的：就是为坚决克服丑化或美化布哈林形象的倾向，特别是为根除旨在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共运史中抹掉布哈林的名字的极端倾向，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认为现在可以或必须在对布哈

林这样一位人物的历史研究和关于苏联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的政治辩论之间划一道明确的和绝对的界限。问题如此棘手，是因为它涉及当代的许多现实问题和悬而未决的症结。今天，世界舆论为布哈林正式恢复名誉的呼声甚高，压力甚大，已形成一场运动，并且要求比赫鲁晓夫时期作出的某些承认更为明确，这是意味深长的。对这种舆论我们已公开声明赞同，敦促平反的实现，而且我们一再强调不仅要给布哈林平反，也要给其他受斯大林迫害的反对派平反，我们认为这样作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虽然我们这次讨论会并不是为要求平反而组织的，但既然要立足于对历史进行的分析和讨论之上，就必然要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和它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样，讨论会希望不怀成见地分析布哈林的全部业绩，促使具有不同意见和倾向的学者之间展开争论，这就等于再一次要求各位学者打破沉默，畅所欲言，纠正长期以来对布哈林所起的作用的歪曲。更广泛地说，就是希望清除30年代苏联的政治斗争所造成的这些悲剧性后果。

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确立研究自由和评论自由，它超越会议要讨论的人物的界限。它关系到会议讨论过程中会触及并引起争论的许多特殊问题。例如，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可否把布哈林的路线看作是能够取代斯大林主义的一条可行的路线。我这里指的主要是他反对用强制方式实行集体化这一时期的路线。这个问题是以对历史进行评论的形式提出来的，对它的讨论当然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但它也有其更为现实的内容。那就是可以验证一下，布哈林的业绩，或更确切地说，他的活动的某些阶段以及他的思想的某些侧面，是否

曾经构成或可继续成为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些在苏联国内外致力于抵制斯大林主义遗产的力量的指路标，是否（与右翼反对派，特别是与李可夫的主张一起）对1956年以后在东欧各国出现的进行改革的愿望和计划产生过某些影响，问题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可以认真地研究一下，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或各种马克思主义的错综复杂的、面目全非了的、有时甚至已成为其反面的现状中，是否存在布哈林的思想遗产。

用可以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取代物这种观点来研究布哈林，无论是把它作为历史评价的问题，还是作为研究和阐述苏联国内现有的改革思潮的问题，或是作为研究和阐述当代世界中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所受到的最为广泛的影响的问题，这一研究都显然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不论其将会达到的结论如何。但是，我想就关于布哈林问题的现实意义的其他一些看法表示一点疑问，有时盛行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在布哈林的全部活动中，比共产主义的其他理论家和领袖的业绩中，有更多的更适合于用新的、卓有成效的方法解决当代世界工人运动面临的全部重大问题的因素。据我看，这种夸大布哈林主义的现实意义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形态与他的联系（特别是关于第三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等问题）的企图，产生于对布哈林某些思想的过高评价和对他所处环境的某些特定因素的孤立看待。

我认为，倘若我们综观全局，既不忽略有关以布哈林主义代替斯大林主义的争论的现实意义，也不忽略布哈林关于市场、计划性、工农关系的某些论述的最为广泛的价值，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布哈林的共产主义仍在苏联布

尔什维克革命及其发展的经验以及它所提出的问题的范围之内。布哈林关于必须考虑到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的条件各不相同的观点，可以说是原则性的意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依我看来，这些见解并不能证明布哈林已超出了苏联的经验，不再受其制约。当然，苏联的经验也是重要的。

另一方面，研究布哈林的学者们的基本兴趣在于通过对布哈林本身的研究，进一步加深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它的发展、以及它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的历史分析。所以，我认为，从他与列宁的最初接触和1915年发表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文时算起，到他被处死为止，重点是他反对斯大林的那段最富有创见和最活跃的时期，把他所起到的作用全部论述清楚，这种占优势的意见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如果孤立地看待布哈林的全部活动，而不是将其放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当中进行考察，就既不可能对他本人也不可能对历史作出恰当的评价。必须承认他所起的重要作用的道理即在于此，况且他的案件及被枪决也都是对苏联的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基本资料。

了解到这些看法，就可以理解我们对苏联学者未出席会议感到的惋惜了。西方史学界对布哈林作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丝毫没有使苏联历史学家的贡献变为多余或无足轻重。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至少可以部分地赞同罗伊·麦德维杰夫几年前表明的观点。麦德维杰夫尽管承认了西方史学界作出的积极贡献，但是他指出：“在说明1917年及其后年代中发生的事件的真相方面，承担最重要的工作”是苏联历史学家们的责任。所以说，苏联历史学家的缺席实为一大憾事，

虽然这不能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之所以抱憾，还因为我们本想在这次聚会中，不同观点之间可以展开讨论。

另外，西方学者本身之间的观点分歧也为数不少。一些认为布哈林在苏联政治史中占不了多大分量的学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即使并非所有的观点都已在这里陈述，现有的材料已经足以排除轻而易举地达成一致意见的任何可能性。众所周知，彼此对立的观点是有关布哈林是否始终一贯地反对斯大林制度的确立，以及他参加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意义如何等问题。除此之外，我想，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我们探讨“有现实可能性的替代”时，只限于提到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名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派别，而置1930年后在苏共内部出现的其他反对派于不顾，这样做是否正确？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有一个布哈林影响的问题。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批判地分析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时，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一般说来，葛兰西的分析一直被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所忽视。但我认为他的分析是重要的，因为他的批评不仅针对布哈林独特的论点及其论述方法，而且对在整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见也具有针对性。我相信，如果我们用这把钥匙，用这种更为广泛的观点来阅读《札记》中有关布哈林的论文的篇章，我们就会理解它的真正含义。

我不打算探讨对布哈林的形象进行的历史分析所提出的全部问题。我作了一些提示，只不过是想说明我们召开这次讨论会的动机，避免某些可能会出现的误解。前些日子，一份